

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

——兼与黄彦同志等商榷

肖 致 治

如何评价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存在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认为一八九五年前，孙基本上是个改良主义者^①；有的人则主张这时革命思想是主要的^②；也有人觉得孙这时虽有革命思想，而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改良思想^③。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评。

一九七八年七月，《学术研究》第二期发表黄彦同志《孙中山早期思想的评价问题》一文，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黄彦同志认为：“在孙中山的思想统一体中，一方面已出现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意识；一方面又有希望清政府‘奋起’以领导推行‘新法’的改良主义意识；在这处于不均衡状态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后一方面，正是在改良主义思想意识支配下，才做出了上书于统治阶级当权派或有权势人物的种种举动。”黄彦同志在文章中对孙中山早期留存的三篇作品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但所作的结论则值得商榷。下面拟谈点个人意见，请批评指正。

一

要正确评价孙中山的早期思想，确定他的基本倾向，探明他怎样由萌发革命思想到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有必要对孙中山早期各种思想倾向进行综合的全面的考察，从中找出主导的、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并且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各种因素的消长和内部联系，然后才能引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途程中，一八九五年前还处在孕育和成长时期，发展尚不成熟。深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爱国感情，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促使他上下探索、左右寻求，希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途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废寝忘食，博览群书，广泛阅读了中国古籍和西方国家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农学、物理、军事、历史等类著作。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八九七年，孙在致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书中自称：“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可以想见，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是庞杂的，有各种思想的因素存在。我们只有对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考察，在掌握它的总和中找出主流，才能确定何种思想是基本倾向。

孙中山早期思想里主要有那些因素呢？

一、反对外国侵略、渴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孙中山出生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两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压迫越来越重。这种环境使他很早就萌发了爱国思想。还在少时，他听到二婶母讲述洋人欺压中国居民的暴行，就表示应该想法子去对付这帮蛮不讲理的洋人。^④一八七八年到檀香山后，亲眼看到国内外的不同情景，“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⑤中法战争期间，受到人民反法斗争的巨大鼓舞，反帝爱国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长。自后经常以爱国图强为题与人们交谈，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如何救亡图存，成了孙中山经常考虑的课题。

二、反清革命思想。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势下，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卖国投降，对内疯狂镇压，激起孙中山异常愤慨。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萌芽也很早。童年时代听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就产生景仰和敬慕的心情，惋惜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⑥少年时期，随母亲到檀香山依靠哥哥孙眉读书，由于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对清朝的专制统治更加不满。回国以后，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声言要把政柄拿过来，“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⑦中法战后，痛恨清政府卖国投降，决志“倾复清廷，创建民国”。^⑧此后不久，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五年（一八八七——一八九二），与同学好友天天谈革命，向人们也经常抒发革命情怀，劝告人们认清“现状之危”，奋起自救。西医书院毕业后，在行医过程中对清朝黑暗统治领略更深，尤其感到“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⑨反清革命思想明显在形成中。

三、改良维新思想。一八八七年，孙中山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结识了该校创办人何启。一八九一年前后，和郑观应有通讯往来，就时政问题交换意见。一八九四年北上天津途中，在上海通过郑观应结识了王韬，请王为《上李鸿章书》润色。当时改革维新思潮正在兴起，孙中山和这些著名改良派交往，不免受到影响，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共鸣。如何启、胡礼垣批评“洋务新政”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⑩，孙中山也斥责洋务派“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⑪。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鼓吹“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⑫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直接汲取郑的主张并加以发展，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⑬四大纲，明显地是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

四、振兴农桑的重农思想。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幼时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民疾苦比较了解，因此很早就注重农桑，孕育了重农思想。在香港学医期间，孙很注重农学。假期还乡，向农民介绍科学选种、施肥，并且考察土壤，试验种桑。现今留存的三篇早期著作，则是孙中山早期重农思想的结晶品。《致郑藻如书》把发展农桑列在“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的三项建议之首^⑭；《农功》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⑮，《上李鸿章书》把发展农业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第一要图，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在这种重农思想指导下，他主张派人到西方各国考察农业；发展农业科学，改良农桑种植；采用农业机器，提高耕作技术；设立农官，

加强农业管理等等。

上述诸种因素中，反帝爱国思想是基础，是推动孙中山寻求救国道路的强大动力。当时中国已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四面包围中，外国侵略者纷至沓来，个个咬牙欲噬，妄想吞食中国这块肥肉。民族存亡，危如累卵。这种危局正如兴中会宣言中描述的：“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①6}面对这种形势，如何挽救国家危亡，成了一切爱国者心头最紧迫的问题。革命救国，改良救国，实业救国，……多是在这种紧迫形势下提出来的。目的都是企图挽救国家危亡。

孙中山的重农思想和其他有关经济主张，实质上是一种实业救国的方案。他渴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振兴农桑，发展工商矿业，改革教育，培养人才等，以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但是，经济建设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前提，它只能作为政治改革的补充和发展。在当时情况下，不实现政治改革，任何发展经济的美好理想，都只能是空想。

革命和改良，是当时形势下提出来的两种主要救国方策，都还处在萌芽和发展阶段。严格说来，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政治主张，彼此之间界限也不清楚，还没有发展成为两条明显对立的政治路线。当时何启、郑观应、王韬等人都是改良救国的吹鼓手，而孙中山则是革命救国的急先锋。在孙中山的思想里，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一度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主导的，起支配作用的一直是革命救国思想。所以，我赞成革命思想是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其理由如下：

第一、反清革命思想经过多年的酝酿，改良思想不过是一度受到的影响。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前所述，年幼时候已在萌芽，中法战后已很明朗。孙中山去檀香山前，除听了太平天国故事非常羡慕惋惜外，对一些封建恶习如蓄奴、缠足等也表示不满；在私塾里背诵“四书五经”等封建经典，曾厌恶地说：“读这些书，一点也不懂，有什么意思？！”^{①7}平常好打抱不平。遇不平等事，常挺身而出，仗义反抗，绰号“石头仔”。^{①8}这时孙中山年纪很小，当然谈不上有明确的反清意识。但由这些可以看出，孙从小就富有反抗精神，为他后来反清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八七八——一八八三年间，孙中山在檀香山求学，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制度，华盛顿、林肯的革命事迹，檀香山人民的反美斗争，又为孙中山的反抗思想滋补了新的养料。一八八三年回国途中，从香港到香山，孙亲身经历了清朝关吏的四次无理勒索和搜查，愤慨地对旅客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①9}回国以后，除宣传政治必须改造，要把政柄拿过来外，还和陆皓东一起折断村庙北极殿北帝的手指，刮破金花夫人神像的面皮，公开向维护封建统治的神权挑战。这时孙中山尚未成年，政治思想仍不成熟，但是耳濡目染，从切身体验中已逐渐认识到腐败的清朝专制统治是社会进步的障碍、国家衰亡的根源，反清革命思想正在酝酿之中。中法战后，民族的危亡，清政府的反动，人民的英勇斗争，成了孙中山决志革命的催化剂。反清革命思想开始形成。后来他多次谈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②0}“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复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②1}自后十年间，反清革命成了他经常考虑、谈论的主题。至于改良思想，虽然在阅读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可能接触到，并曾作过些地方改革的试验，而主要则是在进入香港西医书院与何启等人接触以后，才受到较大影响。而当上书李鸿

章的改良尝试一旦失败，很快就抛弃了。所以，从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从少时富有反抗精神到决志革命，这条线索是清楚的，是主流；而改良思想只不过是受到当时潮流的一些影响，在孙的思想总体里，并没占多大地位，顶多只能说一度受到严重影响而已。

第二、在孙中山受到改良影响时期，革命思想仍然处在支配地位。一八八七——一八九四年间，正当孙中山高谈革命、积极策划革命的时候，改良主义思想正作为一种新的思潮在全国兴起。孙中山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是可理解的，但说他已“把主要精力用于探求、试验并向统治者提出改良救国主张”则不是事实。据孙中山自述，一八八七——一八九二年在香港西医书院时，他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朝夕相处，“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②被人称为“四大寇”。另据檀香山华侨宋居仁说：一八八五年春，孙中山第二次离檀时亲口对他讲：“我回唐学业有成，然后再谋推倒满清，复回汉族山河，务使我汉人得享自由平等幸福。”^③和孙朝夕与共多年的陈少白说：“他进校（指入西医书院）以后，天天谈革命。……并且还起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洪秀全’。因为孙先生平时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④孙在西医书院的同学关景良说：“至一八八九年，总理的言论已充满革命思想，要推翻清廷，废除帝制。”^⑤这些明白的记述，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思想里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反清革命，从他要“推翻清廷，废除帝制”，“务使我汉人得享自由平等幸福”看，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确在酝酿之中。一八九二年西医书院毕业后，孙一面行医，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后来通过行医实践，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重要，更把主要精力从事革命活动。这些年间，如在广州抗风轩和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聚会，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试制炸弹，联络会党等，表明不仅有革命言论，而且行动上也在开始筹划。至于改良思想言论，目前所能见到的就是留存的早期三篇作品。这些文章的基本内容，正如黄彦同志指出的，是使国家循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经济建设主张，只是就其希图依靠李鸿章等洋务派来贯彻而言是改良主义的。如果不顾这时期大量存在的反清革命思想、言论、行动，单凭这三篇文章就认为改良主义意识居于支配地位，恐怕是不妥的。

第三、判断是改良还是革命，主要的标志应该是政治态度，即是主张推翻清朝帝制还是维护清朝统治。前面列举的大量言行表明：孙中山决志推翻清廷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这里还可以补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据关景良回忆，孙在西医书院读书时，他的母亲黎氏常常邀孙到家中与关景良兄弟同游共食。一次，关母见孙中山言论激烈，就问道：“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东制台吗？”孙答：“不”！“想做钦差吗？”又答：“不”！“然则想做皇帝吗？”孙答道：“皆不想。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皇帝更高大了。”关母对反清革命很不理解，以为是妄想空言，乃以‘孙悟空’目之。^⑥这个故事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情绪。什么皆不想，“只想推翻满清政府”，生动地刻划了孙中山反清革命的坚决意志。和孙中山相反，当时改良派众口一词，无不鼓吹推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维护清朝统治，孙中山对此不但不表赞同，而且使劲宣传反清革命，和他们唱对台戏，表明在政治态度上孙中山和改良派是根本不同的。至于《上李鸿章

书》属于改良行动,我完全赞同。《上李鸿章书》是在改良意识支配下的行动也是事实。但有关的改良言行加在一起,在孙中山早期思想的总体里也只能是一个插曲。以此为据,说孙中山早期思想里,改良思想意识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明显是夸大了。须知,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行动是实在的,可并没有寄很大希望,仅仅是试一试而已。三年以后,孙在《伦敦被难记》中就说得很明白:上书只不过是“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②而且他不直接上书清廷,却上书李鸿章,还有幻想利用满汉矛盾的意图,和一般改良派死心维护清朝统治是有区别的。怎么据此就可论定改良主义意识是孙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呢?

第四、上书失败,孙中山立刻抛弃改良幻想,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也说明前段革命思想是基本倾向。思想的发展和一切物质的变化规律一样,总是由渐变到突变的,没有渐变就没有突变。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实践使他认识到改良道路走不通,“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③于是很快丢弃了一线改良幻想,踏上坚决革命的征途。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正式举起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旗帜,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航程。如果前期革命思想不是基本倾向,孙不可能转变得这样快!如果前期改良思想是基本倾向,孙转变得如此坚决,如此快捷,就成为不可理解。

二

上面考察了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各种因素,经过分析比较,得出结论,革命思想应是孙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在分析中,对主张改良论者的某些论点已有所触及,但有些还没有谈到。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有必要把一些主要论点讨论清楚。

主张改良是孙中山早期思想基本倾向的同志有一个主要论点是:判断早期基本思想倾向应以早期作品为根据,晚年自述虽值得重视,难免“记忆上不发生差错或表述上做到准确无误”。这种提法用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正确的。可是,用在孙中山早期的特殊情况下则未必合适。应当看到,清朝自入关以后,推行高压政策,前后兴文字狱八十多次,人们动辄得咎。往往一字之差,立刻招致满门诛灭。在这种严密的思想箝制下,文字上稍不留心,动遭横祸。孙中山就是因为在广州读书没有言论自由才转学香港的。即使到了香港,谈论革命,除得到二三好友的支持外,一般人“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④谈论革命尚且如此,要求孙中山公开发表鼓吹革命文章谈何容易!恐怕孙中山敢写,当时也没有那家报刊敢于发表。即使后来在远离祖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有些华侨听到孙中山要革命造反,“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惊走。”^⑤孙中山为了解除群众顾虑,只得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秘而不宣。到同盟会成立时,革命宣传本来已比较普遍,但仍然有不少人怕亮出“革命”招牌,只得将“中国革命同盟会”名称略去“革命”二字,改为“中国同盟会”。尽管就革命者来说,可能是出于策略考虑,亦足证明压力仍然不小。另一方面,后来的追述虽然一般不及当时作品准确可靠,但如前面引证的一样,孙本人是多次追述,而且许多友人回忆,有时间,有地点,情节具体,异口同声,都说这时孙中山决志反清革命,就没有理由委

为记忆差错或不准确。应该说是可信的。因此，不考虑当时实际，一定要以现存作品定性，显然是欠妥的。何况这三篇作品谈的基本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是改良呢！

理由之二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幼弱，民族资产阶级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新企业家们只能通过其代言人，通常是采取上书请愿方式，提出一些不触动现存统治秩序的资产阶级性改革主张。”幼弱表明力量不大，可能导致反抗不力；如认为幼弱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决定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不在于它的幼弱，或者是刚在形成之中，而是它的政治经济地位，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与矛盾。如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隙缝中产生的。它一出世，就受到封建主义的摧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刚刚建立，封建士绅就斥为“异端”，被当地政府勒令停工。还有一些工厂矿场设立不久，就借口“不安本分”，被勒令停办。至于因受外资排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往往“一二洋商居奇垄断，即足制千百华商之死命”。^③不少民族企业由于遭受双重压迫，不是惨遭夭折，就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这种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感到，只有通过革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束缚，才是根本的出路。因此，不是幼弱决定他们只能改良，而是深受压抑迫使他们必须革命。按照弱幼只能改良的逻辑，资本力量强大些，革命性就应该相对强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比中下层力量强大，由于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多，受压迫较少，正是他们最不革命，最怕革命。这怎么解释呢？怎么能说幼弱就只能通过其代言人提出改良主张呢？！

理由之三是这时孙中山的反清思想仅仅是“反满复汉”，还没有和民主共和思想结合，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形成。诚然，孙中山这时的革命思想言论主要是推翻清朝统治，至于推翻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直到兴中会成立，才在誓词中较明确地提出“创立合众政府”。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之前必有一个酝酿过程。前面提到的宋居仁、关景良的回忆已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外，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经常半夜起床，阅读西方社会政治方面书籍，而且特别喜读法国革命史和进化论，说明他的民主共和倾向是明显的。决不能因为没有见诸文字，就可以不承认。即使退一步来说，他没有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只单纯推翻清朝统治，也不能说不是革命思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目标只是推翻清朝，并没有建立民主共和思想；历代农民起义，目标都是推翻当时的黑暗统治，更谈不上和民主共和思想结合，难道不是革命吗！至于说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尚未成熟，那是完全正确的。

理由之四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般还停留在口头上，“准备‘造反’则是‘将来’的事”。可是，这里评论的正是孙中山的早期思想，而不是早期的行动。早期思想当然应该以他的思想言论为主要依据，他的行动只能作为这时思想的印证。比如，孙上书李鸿章是孙有改良幻想在行动上的反映；而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联络会党、试制炸弹，则是孙已怀革命思想的表现。黄彦同志为了证明孙中山早期改良思想是主要的，曾试图否认翠亨村试验炸弹的可靠性，把联络会党也推到一八九五年。然而，试验炸弹的事，不仅见之于翠亨村，而且见之于香港西医书院。据同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关心民说：“总理既抱革命之决心，即在医院暗自学制炸弹。尝以妇人之裹足布所捲试制之炸药，亟欲试验效力，自

医楼上掷出街外。轰然一声，惊动四邻。警察闻声赶至，密查多日，卒无由知炸声之何来！”^②可见，试验炸弹确有其事，不容否认。至于联络会党活动，开始是较早的。一八八六年，孙中山在广州结识和会党有密切联系的郑士良，郑表示将来反满革命，当率会党相助；^③一八八八年，郑士良辍学回乡业医，在家乡归善（惠阳）联络会党，被推为首领。以后，又得到郑安关于反满必须联络会党的指点。据南洋会党领袖邓宏顺谈：孙中山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一日从香港一道去广州，游览观音山（今越秀山）三元宫，“大放厥词，诽谤清廷”，被在三元宫潜修的、林则徐的师爷郑安闻知，把他们招入内房。郑安听了孙中山“畅言革命排满之志”以后，就指点孙等，“如反满，必须联络会党，始克奏效。因详述会党之组织宗旨，及各地会党分布地址。先生一一牢记之。”^④孙中山后来谈到最先支持革命的除二三挚友外，就数会党。证明一八九四年前联络会党活动是与“革命排满”连在一起的。

*

*

*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研究历史，必须从实际出发，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历史地、全面地考察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评价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也必须如此。我们只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孙中山早期的各种思想倾向实事求是地作全面考察，从他的思想总体中把各种因素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从爱国出发的反清革命是他的基本方面，和爱国结合的反清革命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的伟大，首先在于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表现了崇高的救国救民精神，“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来不为个人谋利禄。”^⑤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他最先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他虽然一度受到改良思潮的影响，当通过实践证明改良不能救中国，就立刻摒弃改良幻想，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在近代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中，孙中山是最伟大的。洪秀全学习西方，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把农民革命推向最高峰，后来终不免思想僵化，生活蜕化；康有为、严复学习西方，发动和领导了戊戌维新，而到后来，一个堕落成保皇派，一个蜕变为复辟派。唯独孙中山善始善终，革命到底。要问结局为什么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就是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前进。孙中山这些可贵品质，在他的早期思想里，就已焕发出灿烂的金光。

注：

① 石峻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107页

②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30页。又金冲及胡绳武在《历史研究》一九六〇年第5期发表《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一文也支持这种意见并作了补充。

③ 秦如藩：《二十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六二年第1期

④ 张克林：《孙中山和列宁》，南京拔提书店一九三四年版第2页

⑤ 孙中山：《非学问无建设》，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141页

- ⑥ 陆天祥：《孙中山先生在翠亨》，《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 438 页
- ⑦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 ⑧ 《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68 页
- ⑨ 《非学问无以建设》，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二集第 141 页
- ⑩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编，《新政论议·胡礼垣序》
- ⑪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第 8 页
- ⑫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1892 年）
- ⑬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上，第 7 页
- ⑭ 中山县《濠头月刊》第十四、十五期合刊
- ⑮ 邓观应：《盛世危言》卷四第 5 页
- ⑯ 《孙中山选集》第 19 页
- ⑰ 杨连合：《孙中山先生的童年生活》，参见林柏克著《孙逸仙传记》
- ⑱ 陆文灿：《孙中山公事略》（稿本）广东哲学社会研究所印
- ⑲ 林柏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 1926 年版，第 126—131 页
- ⑳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中山全书》上海中山书局 1927 年版第四册
- ㉑ 《有志意成》，《孙中山选集》上，第 168 页
- ㉒ 《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第 169 页
- ㉓ 宋居仁口述、吴耕云笔记，见黄大汉编：《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
- ㉔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 ㉕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卷六
- ㉖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卷六
- ㉗ 《孙中山选集》上，第 24 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 ㉘ 《孙中山选集》上，第 24 页
- ㉙ 《孙中山选集》上，第 169 页
- ㉚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 15 页
- ㉛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 269 页
- ㉜ 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卷六
- ㉝ 《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第 168 页
- ㉞ 邓宏顺口述，原载《大同杂志》创刊号，转见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初稿第 39 页
- ㉟ 马湘：《跟随孙中山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 578 页